

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命题陈述、路径展开 与规律阐释

邹庆国¹, 霍咏秋²

(1.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2.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要]“新时代十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命题设定与实践探索,开辟出党的建设新领域,实现了叙事话语的创新突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从侧重于生态要素的改造,到系统性、整体性推进,展示出净化、重构、修复、营造、涵养的多重价值意蕴和多元路径指向,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原则,自我革命是内生动力,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正气之源,规范政治关系是核心旨归,净化党风是基础工程,反腐败是彻底手段,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生态统领作用,坚持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贯通联动。

[关键词]十年伟大变革;党内政治生态;政治发展规律

[中图分类号] D2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08(2023)03-0041-11

DOI:10.16133/j.cnki.xxlt.2023.03.015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新时代十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1]党内政治生态命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范畴,具有深邃的理论意境、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浓郁的政治生态化色泽,开辟出长期执政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新领域,是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突出成果和重要标识。

一、党内政治生态的命题提出与价值意蕴

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和叙事话语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从发生学意义来讲,政治生态起源于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一种先进的政治形式或政治理想——生态化的政治发展观。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对天地人关系的思考中,就萌发了具有政治生态特征的思想观念,并在后世的译注、释义中得以传承与发展。政治生态作为一个规范的学术范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属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印记,是中西

[收稿日期] 2023-03-14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实践路径研究”(17BDJ030)和2022年度聊城市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课题“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组织力研究”(ZDWT2022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邹庆国(1971—),男,山东茌平人,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党的建设与孔繁森精神研究基地研究员、首席专家;2.霍咏秋(1996—),女,甘肃天水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方传统文化共同浸润、滋养的理论结晶。现代政治生态理论滥觞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社会。在西方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暴发的背景下,生态学逐渐兴起,并进入政治领域,掀起了以生态学理念审视政治设计的思潮,呈现出主题切换、机理一致、相互衔接的学理逻辑。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和创新实践来看,政治生态的形式主要包括党内政治生态、国家政治生态与社会政治生态三个层次。党内政治生态在中国政治生态结构中居于中轴地位。党内政治生态命题开辟出执政党建设研究的新领域,是当代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

(一)改进工作作风:政治生态建设命题的提出背景

党风是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观念和一贯行为的综合反映,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文献检索与梳理,净化政治生态命题是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的。他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长期以来,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看来,与政治后果更为直接化、考量标准更为明晰化的党纪国法相比较,工作作风更多地与党员干部的个体性格、习性偏好、领导风格、私人道德等因素相关联,属于应然性政治倡导的浅层范畴,关于其危害性的认识长期不足。实际上,工作作风是党风的最直观体现,也是群众评判党员干部形象的直接依据,关系到党群关系基础。不良风气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政治化学反应”,在政治环境中恶性传播,衍生出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与恶化现象。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不纯、不正,正是消极腐败现象发生的源头,具有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典型特点。无论是从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轨迹,还是从党内制度执行乏力的深层原因来看,这些看似“小节”的工作作风问题的频繁出现,不仅会挥霍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还会使积累成的“亚文化”形态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传播于

政治生活之中,严重损害从政环境。净化政治生态命题的正式提出,标志着党对作风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二)良好从政环境:政治生态优质化程度的外在表征

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既是改进工作作风的根本目标,也体现出政治生态建设的价值诉求与实践取向。习近平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3]。营造良好从政环境就是“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4]。其中,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外在体现,政治清明则是良好从政环境的生态化表达。“三清”目标集中表征着政治生态的优质化程度。此后,在不同场合,习近平又对政治生态与从政环境的关系作出深刻阐述。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5]这一论述,在“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从政环境”的宏阔视野中,揭示出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在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风险判断和矫治机理对比中,阐明了政治生态命题的至关重要性,是对政治生活生态化特征的深刻诠释。

(三)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内涵的界定依据

政治生态命题的提出到党内政治生态的主题聚集,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实现的。“全面”的空间延展性和“严治”的主基调,从理念、路径、方法、机制等方面,均展示出强烈的整体性、系统性、平衡性的生态化治理理念。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

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6]。这一论述中的世情、国情、党情,构成了党内治理的外部环境系统。要厘清二者之间的生态联动机理,就需要在关照横向与纵向、传统与现实、继承与借鉴的关系中坚持整体性思维,通过净化、完善、革新、提高不同意蕴和向度的实践,使全面从严治党行动是系统性的而不是零散杂乱的,有预见性的而不是盲目的,有创造性的而不是守旧的,有实效性的而不是形式化的,透射出鲜明的政治生态学理念。

不同于在改进工作作风实践中提出的“政治生态”范畴,“党内政治生态”是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中正式提出的,一开始就富有党内“风气”的生态化意蕴。2014年,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做到清正严明,“需要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规制和引导”,“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大气候不形成,小气候自然就会成气候”^[7]。此后,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8]这一重要论述对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态在党的建设中的根本性、基础性定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首次。生态是生活环境状况的抽象化表达,离开了人的因素,就无所谓生活环境。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员干部开展党内生活环境状况的总体反映。无论是从政党治理的基本规律来看,还是从一党长期执政的体制运行来说,党内政治生活都与国家政治生活高度统一。规范化、常态化的党内政治生活能够发挥扶正祛邪、激浊扬清功能,通过及时清理各种生态毒素,形成生态学意义上的大气候——风清气正的党内生活环境,进而优化从政环境。要言之,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生活环境质量的整体性体现,是党内政治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状态,以及与自然、国家、社会和市场所构成的外部环境之间协调平衡状态的综合反映。

(四) 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与路径指向

党内政治生态所固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平衡性、协同性特征,要求我们遵循政治生态治理的一般规律,揭示其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意蕴和多元路径指向,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导向,夯实生态之基,清除生态毒素,激活潜在要素,涵养新的生态要素,优化生态联动,实现党内政治生态质量的整体提升。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净化政治生态。在生态学视野中,净化侧重于各种污染物的清除。党内政治生态语境中的净化,是以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价值指向,主要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及会议上说空话、套话的不良会风,文件简报发布中缺乏实质内容而篇幅冗长的不良文风等,着力纠正不良习气和改进工作作风。二是重构政治生态。“重构”命题是随着对政治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而提出的。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9]腐败是政治生态的毒瘤,是众多生态毒素累积病变的产物。高压反腐就是要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党员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建构明规则压倒潜规则的廉洁从政环境。从政治生态的净化到重构,体现出党对反腐败规律的深刻洞悉,赋予政治生态更为丰富的价值意蕴。三是修复政治生态。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确实需要修复政治生态,把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大大恢复和发扬起来。”^[10]这里所讲的政治生态修复,侧重于充分发挥政治生态中优质元素的引领和辐射作用,意指使党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精神品格、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重新发扬出来,使其由弱变强,由隐性向显性转化,促进政治生态的优化。四是营造政治生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11]如果说净化、重构、修复侧重于“破”,政治生态的营造则倚重于“立”,具体路径就是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要管党的逻辑起点,其内容的丰富性、功能的综合性、实践的多元性,决定着需要确立整体性、系统性、联动性思维,把握和运用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规律,构建和完善党内政治生活体系,长效发挥其政治功能,营造出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五是涵养政治生态。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既需要决心和毅力,也需要优质“土壤”和充足“养分”。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让党所倡导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优良传统深入党员、干部思想和心灵。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12]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生态就是文化生态。政治生态恶化,折射出文化生态环境中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缺失而导致杂草丛生、荒芜一片的病变状态,需要有益养分滋养和养护。党内政治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内蕴着真理性、道义性、实践性和批判性力量,通过发挥先进文化形态的主导力、引领力、渗透力、解释力和鉴别力,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丰富滋养。

二、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实践路径与突破进展

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的十年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实践从侧重于生态要素的局部改造,到全方位、全覆盖的整体性推进,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成为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标识性领域。

(一) 中央八项规定: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党风状况是党内政治生态质量的直接体现。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作风问题最为关键。2012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以此为标志,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成为开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中央八项规定涵盖会风、文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长期坚持的铁杠杠、硬规矩。

2017年、2023年,党的十九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均把审议通过、修订完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作为开局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带头加强作风建设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表达出正风肃纪持之以恒、改进作风驰而不息的坚定意志。中央政治局带头执行,以示范力和表率力强化推动力与执行力,是产生良好政治生态效应的根本前提;坚持“恒”“长”原则,切实强化制度执行力,是中央八项规定取得突破性成效的重要保障。各地建立健全“每月公布查处结果、重要节点通报曝光制度”,违规数据在各级纪委监委网站定期公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08个月公布的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至2023年间,“通报23批169起典型案例。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28.6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9.8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8.5万人”^[13]。党内政治生态的净化需要内驱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保证生态净化行为的自发性、持续性、连贯性和稳定性。历史表明,运动式的净化行动只能强化而不能生成这种力量。长期以来,因制度执行乏力而导致的法不责众现象一直存在,单纯从制度设计本身去找原因,会把人们诱入制度陷阱。中央八项规定的成功实践生成以强化执行力为主要标志的内驱性净化力量,推动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性净化,带来作风革命新气象。

(二) 聚集“四风”问题正风肃纪:党内政治生态净化与修复并行共进

根据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突出问题,党中央把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明确聚焦于“四风”——“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14]。“四风”问题是对长期以来党的作风建设面临风险的集中概括。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严肃党的纪律,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抓手和关键举措。以整风精神正风肃纪的生动实践蕴含着净化与修复相结合的生态建设理路。一是以反对特权观念和特权现象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起点。2013年初,习近平着重强调,狠刹餐饮环节的公款浪费之

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公款本身是公共资源,违规违纪消费甚至挥霍公款,就是典型的以权力滥用为手段的特权行为。这种严重脱离实际需要的不计成本的浪费之风,会在社会生活中传播蔓延,破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反对特权观念和特权现象,要求领导干部真正破除“官本位”思想,认识到群众是从实践中选择他们的领导者。只有不断强化群众观念,增强公仆意识,尊重群众、贴近群众,克服特权思想和行为,才能真正获得群众的拥护和信任。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15]二是以反对“四风”作为密切党群关系,修复党内政治生态的着力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党内不良风气是各种生态毒素长期积累、交互作用、不断演化的产物,是疏离党群关系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要确立长期作战、持续纠治的思维观念,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另一方面,要借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集中解决突出矛盾。聚焦于“四风”问题的原因在于,“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16]。实际上,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大都与“四风”直接关联,本质上就是由“四风”催生繁衍出来的。就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而言,反对“四风”能够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治理效应。“四风”问题在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涉及政治信念、价值观念、工作态度、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涵盖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是党内政治生态局部恶化的重要诱因。反对“四风”对于党内政治生态起到了系统性净化和修复作用。

(三)高压反腐:奠定起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深厚基础

腐败是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致命性毒素,也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有效治理腐败,既需要领导集团的勇气魄力和毅力定力,又需要依据不同时期腐败发生的阶段性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思路和策略,还需要科学的领导体制和有效的工作机制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起“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的主基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17]新时代高压反腐模式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反腐败斗争的态势把握风险预判为政策基点,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的归宿,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为政治承诺,以坚持零容忍惩治腐败为立场表达,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为原则遵循,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治本之策,以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为基本方式,以纪检领导体制与巡视制度改革为体制保障,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理念创新与强度升级,奠定了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坚实基础。

(四)破解自我监督难题:营造出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浓郁政治氛围

权力监督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话题之一。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驯服权力、规约权力、防范权力异化,坚守权力公正性的价值向度,是古往今来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与异体监督相比较而言,自我监督确实难度更大。习近平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要通过行动回答‘窑洞之问’,练就中国共产党人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18]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的古典难题,蕴含着从现象世界向本质世界的跃迁逻辑,有待于产生一种全新数学观念。把自我监督比作国家治理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体现出习近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邃理论思考、宽广战略视野和卓越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监督的实践求索与制度创新,为求解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答案。一是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以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为原则,推进党的纪检工作双重领导体制运行的科学化、程序化、高效化,有效防范同级监督乏力的现象。二是建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党纪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确保对所有公职人员监督

的全覆盖,有效防范监督领域和对象的“留死角”“有遗漏”现象。三是以党内监督为主渠道,实现巡视常态化、全覆盖。党中央先后发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见》等制度规定,奠定起新时代党内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权威性保障。巡视工作把政治生态作为重要内容,从政治、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方面全面检视和审查政治生态状况,披露出一些地方和领域政治生态的恶化问题,揭示出官员个人腐败行为与局部政治生态损害的因果关联,开辟出政治生活中的生态问责路径,建构起生态净化的压力传导机制,营造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浓厚氛围。

(五)党内法规建设:提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制度治党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我们党又提出了依规治党新方略,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为净化、重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一是制订具有党内立法法性质的法规条例。2019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规定,“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党内法规的名称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19],对制定主体、法规名称、立规原则、立规程序、立规权限、位阶关系、效力范围、解释权归属等作出详细规定,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立规“碎片化”、内容重叠甚至冲突、解释主体不明确、位阶层次混乱等问题,为实现党内良法之治提供了根本依据。二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多领域推进。2013年,党中央发布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了党内法规建设的内容和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制定或修改的一系列党内法规,涵盖党的作风、干部选拔任用、统一战线、党内巡视、党内监督、党内问责、廉洁自律、纪律执行、机关党建、党支部工作、请示报告、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的主要领域,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动依据。三是坚持纪挺法前,围绕“四种形态”开展监督执纪。党的纪律是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整体布局的一项基本内容,使党纪与国法、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边界更为明晰;在效力上蕴含着纪严于法、纪挺法前的理念与原则,更能彰显党员队伍的先锋队性质和高标准要求。在实践探索中,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20],以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重点,持续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充分发挥党的纪律对党员干部的警示、约束和保护功能。

(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厚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滋养土壤

健康有序、积极高效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活力之源、生命之基,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滋养土壤。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21]。党的十八大以来,切实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态涵养与维护功能,及时清除各种消极力量和不健康因素,是党内政治生态持续优化的根源所在。一是制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法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深刻总结党的历史教训,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满足时代需求、适应党情变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内容体系,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根本性法规依据。二是揭示党内政治生活的“四性”特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2]“四性”是对党内政治生活根本特征的集中概括。政治性是就党内政治生活的主题属性而言的,要求党内生活既要有实质性内容,又要突显政治特性,不能漫无边际;时代性是指时代环境变迁背景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创新问题;原则性是指党内生活要依纪依规开展,是组织的行动,而不是自由选择

的个人行为,更不是帮派性、团伙性活动;斗争性是指对待党内错误倾向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关键在于正视党内矛盾这个客观存在,把握以积极的党内斗争凝聚共识、促进党内团结的基本规律。三是切实提升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严格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为切入点,突出以上率下的政治示范效应,使党内政治生活质量显著提升。2013年,习近平全程参加河北省委常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创了党的历史上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联系并指导一个省级党组织民主生活会的先例。在中央政治局的率先示范下,党内政治生活迈入升温增效新阶段。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的制度成效充分彰显,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更加锐利,党内政治生活的加强党性锻炼、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内秩序、防错纠错、推进党内监督等基本功能得以唤醒激活、巩固强化,不断滋养有益养分,厚培党内政治生态的土壤。

(七)开展主题教育:党内政治生态净化和涵养相结合的有效路径

新时代,党中央坚持净化与涵养相结合的协同推进思路,直面一个时期内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设定前后衔接、理路贯通的特定主题,开展一系列具有强烈针对性的党内集中性教育,起到了良好的生态优化效果。一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之后,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四风”问题,全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对规避“塔西佗陷阱”风险,增强信任感,密切党群关系,凝聚党心民心,进一步增强党的威信,优化党的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干部作风有了重大好转。但是,为人民服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动机上、文件中,要真正落到实处。能否真正出实策、办实事,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关键。人民群众判断党的形象的依据也主要来自领导干部的实际表现。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经过专题教育,反对“四风”成果得到巩固,党内政治生活中严字当头、崇尚实干的良好风气得到树立。三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管党治党的基础在基

层,主体是党员。2016年,党中央在全体党员中开展了“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推动党内教育对象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从中高层向基层延伸,切实强化基层党组织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提高能力。经过学习教育,党员的先进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党内组织生态得到明显优化。四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十九大之后,为进一步破解少数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回答好“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全党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淬炼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坚定了“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使命追求。五是党史学习教育。对于一个百年大党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哪里来,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命题。2021年,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伟大建党精神的正式提出和精辟概括,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梳理和丰富,充实了学习教育的内容体系。党内政治生态的根基更加丰厚坚固。2023年,全党开展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明确提出“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并把大兴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必将对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员教育坚持集中性主题教育与经常性政治学习相结合,成功开辟出党内政治生态净化与涵养相统一的有效路径。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基本规律

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革命性实践,凝结着对“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汇集着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课题的创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规律性认识。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是党内政治系统的结构形态实现优化跃升的逻辑支点和政治前提。政治生态是政治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外在表征。中国国家建立和成长的独特路径,决定着政治发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党,即始终发挥着政治核心和中轴作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是一场全局性、整体性、持续性的变革行动,需要解决许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破除很多领域中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就决定着必须把凝聚思想共识、促进行动统一、保证步骤有序、实现过程持续作为前提条件,否则,就可能半途而废。需要警惕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政治思潮的渗透,市场经济逻辑对政治生活的侵蚀,一些领域借党政分开之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实践,对转型期腐败高发频发与权力体制之间关联的过度解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互演绎,均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党内外少数人对党的领导的思想抵制倾向,诱发一些领域中党的组织权威不足、党内非组织化活动猖獗等政治风险。这些风险既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毒素,也是制约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进程的阻力。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历程来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政治认同,充分发挥“最大制度优势”,是顺利推进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进程的坚实基础和根本原则。

(二)自我革命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生动力

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底色。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和恶化,本质上就是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弱化与蜕化。实践表明,一旦政治环境出现生态性蜕变,净化修复的推进难度就会很大。纠风纠偏、追责问责、规约权力、清除特权、破除潜规则、惩治腐败等生态净化举措,意味着政治生活某些领域中固有利益格局的解构和各种“舒适区”的破除,均会直接或间接、不同程度地触及某些地方、单位、群体和个人的具体利益,会引发或明或暗、形式多样的不合作甚至公开对抗,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甚至丧失。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

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23]。要想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现长期执政使命的角度,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答案的新思考和新概括,也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动力源点。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属性和鲜明的精神品格。党的自我革命所内蕴的价值理念和逻辑机理,所彰显的壮士断腕、刀刀向内的勇气和魄力,正是对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系统性净化,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本色,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根本性内生驱动力量。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党内政治生态的正气之源

风清气正是党内政治生态优良的根本标志。坚定的信念信仰是充盈正气、荡除歪风邪气的不竭源泉。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24]他把理想信念形象地比作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缺“钙”,就会导致意义感缺失,意志消沉、萎靡不振,就无法营造出正气充盈的党内政治生态。革命战争年代,依靠理想信念的力量克服外部环境的挑战,营造出健康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所在。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理想信念动摇是党内政治生态的主要风险。现实中存在的“精神空虚,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算命看相、求神拜佛,迷信‘气功大师’”,以及“心为物役,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25]等观念和行为,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价值观念离散偏移、是非标准混乱的“软骨病”状态。这正是理想信念动摇、政治自信弱化的现实反映。理想信念是党内政治生态的灵魂。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坚定和执着,政治环境中就难以形成并持续释放浩然正气。《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根本目的就在于守护好党内政治生态

的正气之源。

(四)规范政治关系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旨归

从自然生态到政治生态,再到党内政治生态,绝非简单的话语借鉴和置换,而是以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关系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机制,向人类政治生活场域的植入与延伸,涉及政治生活的价值重申与认同、关系重塑与矫正、规则纠偏与创新。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等歪风邪气,让党内关系正常化、纯洁化”^[26]。2022年10月23日,他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促进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27],深刻揭示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长期执政历史使命的党内政治生态的核心旨归。事实表明,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根源于党内同志关系的扭曲异化,会累积生成具有生态破坏力的小气候。只要营造健康纯洁的党内政治关系,就能够形成正气充盈的大气候,以正祛邪、激浊扬清,不断挤压不良风气的存活空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就是通过机制完善与创新,对异化扭曲的政治关系进行纠偏与矫正,重构和营造规范化、法治化的党内政治关系,不断提升党内政治生态质量。

(五)净化党风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基础工程

党风是政治生态优劣的重要衡量标准。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范畴,党风涵盖党员干部的思想、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内含着党风与党纪、党风与廉政、党风与政风、党风与社会风气等多元认知向度。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对党风内涵的理解不全面,存在只注重警惕“高压线”“红线”“底线”,而把一些背离党风意旨的偶发性、个性化行为,视为无足轻重的“常人之举”。中央八项规定的颁布与实践,鲜明表达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治不良作风、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和政治定力。在实践中,各地结合实际进行了规则细化。生态治理效应比较显著的区域莫过于对领导干部工作和生

活待遇方面的规制与矫正。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待遇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化、宽泛化。由于工作性质与内容不同,同一级别的领导干部在实际需求上有很大差别。在“就高不就低”的趋利性心理作用下,很多待遇演化为饱受公众质疑的特权现象。特权现象的存续,会降低领导权威,侵蚀公信力,污染从政环境。对这些貌似“小节”问题的严格规定和严厉矫治,深化了对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规律的认识。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如果前冷后热或时冷时热,前紧后松或时紧时松,就均会功亏一篑。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也要遵循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治理原则,以净化党风为基础工程,切实发挥优良党风的生态涵养功能,不断充实党内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

(六)反腐败是净化和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彻底手段

清除腐败毒瘤是净化和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反腐败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进一步拓展了净化和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观察视域和思考空间。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上防腐、反腐、治腐的立场原则和思路策略,深化了对腐败治理规律的认识。其一,反腐败是持续性、彻底性、革命性的政治行动,不能有松劲歇脚的情绪。“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28]。其二,坚持系统性、综合性、整体性治理思路,不能只重惩治而忽略制度设计和“生态土壤”改良,只重存量清理而忽略增量遏制,只重正面教育而忽略严惩震慑,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29],实现反腐败立法惩治与廉洁文化涵养的有机结合,提升治理效能。其三,精准把握腐败的发生机理和阶段性特征,不能只重视经济腐败而忽视政治腐败以及二者的交织叠加,只重视政治生态而忽视政商勾结对经济生态的损害,只重视社会影响恶劣的“巨贪”而忽视群众身边的“蝇贪”,只重视传统、显性的腐败而忽视各种新型、隐性腐

败,只重视对受贿行为的惩治而忽视对行贿行为的追究,把零容忍反腐惩恶的政治方略落实于治理腐败的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的工作机制中,不断铲除腐败毒素,实现党内政治生态的海晏河清。

(七)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生态统领作用

党的政治建设处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首位,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发挥着统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的地位确定与命题展开,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自觉回归,丰富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内容要素,拓展了党的建设路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挥出重要的政治生态净化和优化作用。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经受的“四大考验”,本质上就是政治考验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风险。具体来说,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所带来的如何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领导核心地位的问题;改革开放考验所带来的如何坚守正确政治方向,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始终保持政治定力的问题;市场经济考验所带来的如何有效缓解商品交换原则与党性原则的内在张力,始终保持政治本色的问题;外部环境考验所带来的如何应对敌对势力打压围堵和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格局,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安全的问题。此外,我们党所面临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种危险”,也反映出党员干部能否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政治追求、优良的政治操守、过硬的政治本领、廉洁的政治行为等政治问题。总之,新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风险,都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直接关联,都是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此,要切实发挥好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引领作用,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态治理效应。

(八)坚持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贯通联动

政治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物,而是社会中的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相互作用意蕴中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要求确立起内生态与外生态贯通联动的系统性思维。一是党内

政治生态与行政生态的联动。各级行政机关与外部环境的互应与沟通中所生成的行政生态,是一种与党内政治生态关系最为密切的外生态。从行政机关人员构成来看,共产党员在各级公务员中占了大多数;从执政方式来看,向各级政府部门推荐党员骨干担任领导职务,是党的领导的重要体现。党员干部在行政活动中的作为表现,决定着行政生态的质量,也是党内政治生态状况的直接反映。优化行政生态,确保权力的人民性、公共性、有限性、法治性,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二是党内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联动。现代政党是社会中的“部分人”的代表这一基本原理,决定着政党始终成长、发展于社会之中。党内政治环境中滋生的山头主义、帮派观念、圈子文化、封妻荫子等生态毒素,均是各种不良社会文化观念向党内政治生活渗透的产物。故而,营造正气充盈的社会环境,寻求社会生态与党内政治生态的契合点,是净化、重构、涵养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环节。三是党内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的联动。考察党内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可以发现,从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到权钱交易、“红顶商人”等问题,均与市场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影响着党内政治生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市场对政治权力有不可避免的侵蚀风险。正如习近平所说:“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0]因此,必须坚持党内生活与经济生活协同治理的联动思维。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斗争有利于净化政治生态,也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有利于理顺市场秩序、还市场以本来的面目,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31]畸形扭曲的政商关系,犹如政治雾霾,严重污染党内政治生态。因此,需要时刻警惕其对党内政治关系的腐蚀风险。净化经济生态命题的提出,彰显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路向——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的协同净化,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升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整体效能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 〔1〕〔28〕〔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4、69、69.
- 〔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6.
- 〔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N〕.人民日报,2014-07-01.
- 〔4〕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
- 〔5〕〔6〕〔7〕〔8〕〔9〕〔10〕〔12〕〔24〕〔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33、7-8、29、37、369、34、136-137、159、61.
-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44.
- 〔13〕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N〕.光明日报,2022-10-28.
-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83.
- 〔15〕〔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508、511.
- 〔16〕〔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74、388.
- 〔19〕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N〕.人民日报,2019-09-16.
- 〔20〕〔23〕〔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442、591、251.
- 〔2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2016-06-30.
- 〔2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 〔26〕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N〕.人民日报,2019-01-12.
- 〔27〕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J〕.求是,2023(1):4-14.
-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9.

〔责任编辑:王珂〕